

「東亞的知識交流——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」
與「東亞近代知識轉型中的關鍵概念詞」
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

Summary of “Intellectual Exchange in the
East Asia: Rethinking on Keywords” and
“The Key Conceptual Words in the Contexts
of the Modern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
in East Asia”

簡 中 昊*

Chien Chung-hao

位於京都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（簡稱日文研，以下同）在2012年11月13日至17日，舉辦了為期五天的「東亞的知識交流——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此會為日文研的鈴木貞美教授於退休之前，集「東亞的前近代知識交流——以概念的形成為中心」研究班十年來的大成所舉辦的盛會，邀請到日、中、臺、韓、德的眾多學者參與。其後，諸位先生意猶未盡，於2013年3月18日

* 作者現為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博士生。

於臺灣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，另舉行「東亞近代知識轉型中的關鍵概念詞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主要由日文研與中研院雙方學者，就前次的議題更加深化討論。兩會可說是具有銜接性質的「姊妹」型研討會，就近代東亞知識脈絡中的「概念」與「關鍵詞」的演變，以及今日的現實意涵作出了深刻的討論。筆者有幸能參與兩次大會，在此略述盛況。從論述主旨而言，兩次大會的演講與論文發表，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面向：

首先是針對東亞概念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，由來自日、中、臺、韓的四位學者發表了精彩的演說。日文研的鈴木貞美教授的講題為「東亞概念編制史研究的意義與展望」，指出自七〇年代起，國際間對生態與環保問題日趨重視，後人類主義（posthumanism）的風潮遍及各學界，但卻缺乏從根本上對教育及研究制度的檢討。因此他早年便提倡應對東亞近現代的知識體系，以及在背後支撐知識體系的理念加以研究。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，1926-1984）、雷蒙·威廉斯（Raymond Williams，1921-1988）與科塞雷克（Reinhart Koselleck，1923-2006）都曾經進行過概念史的相關研究，但是難以直接適用在近現代的東亞地區。究其原因，東亞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，接受了近代的歐洲、特別是英語圈的各種概念，再將自身的傳統概念解體重製，形成了東亞獨有的近現代概念體系，因而無法直接適用既有的歐美概念史研究，必須同時就歐洲的近現代概念史與東亞傳統的概念體系加以探討。中國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章清教授的講題為「新名詞與中國歷史的重塑」，提到新名詞構成了重塑中國歷史的基調，其中所呈現的話語轉向，是中國納入「普遍歷史」（Universal History）的過程。重要的不僅是新名詞進入歷史書寫中，同時也必須關切是什麼因素影響歷史學科的成長，改變了中國對於「過去」的認知。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鄭文惠教授的講題為「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——觀念史方法與視域」，指出概念是一種抽象表述事物、理解世界的思維圖式，而觀念是一種具有可溝通性、可分享性，意識形態化

的價值信仰，維持著社會關係的發展與運轉。特別是在社會文化的轉型期中，觀念隨著與他者文化的調停、協商而越加劇烈變化，關鍵詞在其間扮演著重要角色。透過對關鍵詞的考掘，我們可以描摹出當時的社會意識與歷史變遷，進而找出中國／東亞／全球間自我與他者觀念域的互文再現與文化交涉。而以數位化文獻及研究型數據庫為基礎，透過數位技術與人文研究跨領域的合作與應用，拓進數位人文技術，建構數位人文學方法論，所形成的「數位人文學」，則可說是觀念史研究的新進路。韓國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許洙教授的講題為「韓國的概念史研究現狀與展望」，指出韓國的概念史研究分為三期：第一期是1990年代初期到2000年，以近代的「宗教」跟「文學」概念研究為主，代表性的學者有張錫萬跟黃鐘淵。第二期是2000年到2007年，主要是以開化期（1876-1910）為中心，針對國際政治學跟文學領域進行共同研究。此時期的特徵是針對韓國的近代性的剖析，以梨花女子大學韓國文化研究院的共同研究為代表。第三期是2008年至今，以德國概念史為發軔、承接國際概念史學界的理論與經驗而衍生的研究成果，在各學科、學門間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。特別是接受人文韓國計畫（HK）支援的翰林大學翰林科學院在其間扮演著重要角色。許教授認為，今後韓國的概念史研究應注意到「周邊性」與「歷史的連續性」。韓國高麗大學李漢燮教授的講題為「近代韓國語料庫呈現的近代新概念與其內化」，提出概念史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語彙史研究，而實際上運用語料庫進行研究的學者也不少，如金觀濤、劉青峰教授。¹ 李教授目前則嘗試使用近代韓國語料庫，來探討近代東亞語彙的交流與傳播、新名詞及概念的成立與內化等課題。

¹ 金觀濤、劉青峰建立了共有1.2億字的「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（1830-1930）」，內容涵括清末民初近代期刊、晚清檔案資料、清季經世文編、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、晚清來華外人中文著譯、西學教科書等六大類近代政治思想重要文獻，以此為基礎，撰寫成《觀念史研究：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，2008年）一書。

其次是關於近代「亞洲」或是「東亞」此一概念形成的研究。德國波本大學萊因哈特（Reinhard Zollner）教授在〈構築「東亞」的思想過程〉一文中，提及十九世紀以後，東亞諸國面臨到西洋列強的侵襲危機，必須重新檢討彼此間的區域性關係。近代日本面臨到傳統華夷秩序的崩壞，不得不重新建立對亞洲的區域觀念。相對於從英美法等殖民帝國提出的「極東」概念，明治時期的日本採用了由德國地理學衍生的「東亞」概念。自甲午戰爭後，「東亞」的使用日趨頻繁，同時近代日本也意圖以「東亞」跟前近代中國所主導的「東洋」作出區別。京都大學客座研究員帕克（Pekka Korhonen）教授在〈不斷改變的「亞洲」概念〉一文中，提及「亞洲」一詞的概念在幾千年來不斷地變遷，而「亞洲」的西方邊界也不斷地擴張，但最初僅是作為地理性的陳述，並不包含政治上或是文明上的含意，直到二戰之後才有所改變。如今「亞洲」已經是一個政治性的常用套語，代表著一組強而有力的政治理論詞彙，被廣泛地運用在亞太地區의各種目的。

其次是關於近代東亞各國內部諸種概念形成的研究。韓國漢陽大學史學科朴贊勝教授在〈韓國的民族概念之成立〉一文中，以《皇城新聞》跟《大韓每日申報》為材料，分析在近代韓國的「民族」此一字彙，是如何作為翻譯詞彙，與「同胞」、「國民」、「人民」等字彙互相競爭之下，成為今日所論的「民族」概念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呂文浩教授在〈近代中國的優生學與人種概念〉一文中，提到嚴復與章太炎分別自英國與日本引進了優生學知識，並致力於「保持」或是「提高」中國的人種。在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之間，優生學日益興盛，近代中國對人種的關心也越顯高漲。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克武研究員在〈近代中國思想中的迷信〉一文中，指出迷信一詞於唐代便已出現，指涉儒家以外的佛道教、民間信仰或基督教，也包含對「不經思考便相信他人」的批判態度。而近代中國的迷信觀念源自於日本，同時與宗教相連結。1897年後，「迷信」一詞的使用頻率日增，而如何界定科學、宗教、迷信等觀念亦成為學界的焦

點。日本弘前大學吉田比呂子教授在〈日本的「神話」概念之成立〉一文中，提及在1890到1920年間，日本興起對國文學、國文學史進行科學性研究的風潮。以世界性的視野定位自國的文學，是日本與西洋列強對等的證明，其方法便是讓近世國學接受近代科學的洗禮，搖身一變而為國文學、國文學史研究。在國文學研究發展的過程中，「神」的概念從1910年代初期所指的廣義多神教，變為「萬世一系的皇祖神」，「神話」也從「諸神的故事」轉為意指「記紀神話」。「日本神話」成為神道國家的背景與裝置，使得近代日本的國民國家得以成形。日本大阪府立大學金子務名譽教授在〈日本的「科學技術」概念之成立〉一文中，提出「科學」與「技術」原先是兩個概念，現代日本所用的「科學技術」此一語彙，其實是經過兩次概念發展期才形成的：第一次是在昭和十五年（1940）左右，在「技術立國」跟「總動員體制」的背景下，技術官僚提倡「科學技術」作為新口號。第二次則發生在敗戰後的美軍佔領期。

第三是限定時間與空間，以特定事例為中心的概念形成研究。日文研劉建輝教授在〈鴉片戰爭以前「概念」的形成——以廣州傳教士的活動為中心〉一文中，提出隨著1810年代廣州十三行的成立，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體制最終顛覆了傳統的清帝國貿易體制，使得全東亞的「門戶」都開放了。而以十三行為中心，來自英美的個人貿易商的群聚，成為近代租界的發軔。在此之中，傳教士以及他們所進行的翻譯、印刷以及編纂辭典等活動，將近代的諸概念引入了中國，如羅伯特·莫理森（Robert Morrison, 1782-1834）就是一例。日本靜岡藝術文化大學孫江教授在〈作為表象的宗教——一八九三年芝加哥萬國宗教大會與中國〉一文中，指出該會為首次討論「中國的宗教是什麼」的國際性宗教大會。而在中國“religion”最初由十九世紀的傳教士翻譯為「教」，但以儒家的觀點來看，「教」指的是教導、教育體系，並不相應於“religion”的意義。到了1880年代初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借用中國的佛經字彙，將之譯為宗教後再傳回中國，經過黃遵憲、康有

爲等人的沿用，才逐漸定型爲現代所使用的「宗教」意義。中國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夏維中教授在「明清交替與歷史書寫——以陳於鼎爲例」一文中，提及明清交替之際，某些士人獲得的歷史評價或形象並不是依據他們的真實表現，而是另有所據，陳於鼎便是一例。因爲陳家放縱門下豪奴恣意妄爲，引發宜興民變，使陳於鼎成爲晚明縉紳貪婪形象的符號，再加上隨著明亡引起漢族士人對自身的反省、清朝的有意渲染，使得陳於鼎在明清交替的真實形象遭到了有意的湮滅。日本學習院大學木村直惠教授在〈「社會」的以前與以後——明治期日本的「社會」概念及其想像性編成〉一文中，指出因爲對近代日本而言，對「社會——“society”」概念的探求不僅止於翻譯及思想上的理解層次，因此也必得考慮，因循著此一觀念，人們如何構築人際關係、如何對社會產生實體性的認識、如何構築自我與社會間的關係等，關於「社會」概念的實踐與想像力的問題。日本德島大學依岡隆兒教授在〈由舊制高校看「青春」概念的形成〉一文中，提出「青春」是近代前所未有的概念。在大正（1912-1926）到昭和（1926-1988）年間的舊制高校，不只參考德國的教育制度、重視德文教育，也流行教養主義與青春小說，以及跟德國師生的交流，藉由與德國的文化交流，產生了日本的「青春」概念。日文研東晴美教授在〈從芝居到演劇：演劇概念的形成與樂劇以及對傳統演劇的再評價〉一文中，指出日本是以近世稱爲「芝居」的歌舞伎來理解近代傳入的演劇，勢必有不盡相符之處。作爲“opera”（歌劇）的相對概念，演劇改良會則試圖以推動「只歌不舞」的演劇，來處理觀念上的混亂。

其次是關鍵詞的概念研究。韓國高麗大學經濟學科李憲昶教授在〈“Political economy”在亞洲的翻譯詞彙之原義與其變遷〉一文中，指出漢字原先所說的經濟，指的是經世濟民，跟古典學派的“political economy”有互通之處，但是跟新古典學派強調的「分配資源的合理性」則沒什麼關係。因爲分配少量資源的抽象概念只在歐洲出現，

所以在翻譯上勢必出現困難。李教授分析了“political economy”和“economics”在漢字文化圈的相應翻譯詞彙的出現以及其變遷。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副研究員在〈從新名詞到關鍵字：以「殖民地」為例的思考〉一文中，指出「殖民」、「殖民地」和「帝國主義」這幾個「新名詞」，自從在1890年代中期誕生以降，為理解「世界秩序」的變化趨勢，思考自身國族定位，打開了寬闊的思想空間，可以說是幫助中國知識人在「認知地圖」上定位歸向的「規範詞彙」。

最後是以「人」或「文本」為中心的概念研究。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哲嘉副研究員在〈《重訂解體新書》譯詞的改定與方法〉一文中，指出大槻玄澤承其師杉田玄白之命，重新翻譯《解體新書》。大槻面臨存在於翻譯之間兩種語言的價值衝突問題，採用實用主義考證方法，有時必須為了讀者順應漢文習慣作出妥協。日本弘前大學李梁教授在〈從《白鹿洞書院揭示》看近世東亞知識空間——與《耶穌會學事規定》的比較〉一文中，提出朱子學對近世東亞的知識空間之影響力自不待言，而朱熹的《白鹿洞書院揭示》對於近世東亞書院史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另一方面，《耶穌會學事規定》對於近代歐美的學校教育跟學制也是影響深遠。若將兩者互相比較，會發現意外地有許多共通之處。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田中比呂志教授在〈清末民初的中國「民族」概念的消長——以本國史教科書的敘述為中心〉一文中，指出清末的教科書以建設中央集權的近代國家為志向，而中華民國成立初期的教科書則高唱「中華民族」、「五族共和」等口號，這是因為中華民國需要尋找新的民族統合可能性之故。日文研瀧井一博教授在〈作為象徵的天皇——以明治憲法論之〉一文中，指出明治憲法所規定「萬世一系」的天皇存在與其說是法律概念，更像是文學描寫，表達出井上毅在起草憲法時，期盼天皇在憲法中呈現的是社會性及心理性的功用。伊藤博文所言「天皇為日本的“Representation”」，指的並非天皇代表日本，而是天皇為日本國之

「彰顯」。因此天皇具有對外國之表象性，同時亦為國民統合之象徵。為了使明治憲法能與日本國緊密結合，而非單只是模仿西洋的立憲主義，因為伊藤採取的方法是讓憲法與日本歷史緊密相接，同時讓憲法「日本化」，所以憲法第一條當中所規定的「象徵性」天皇存在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要件。日文研路特曼（Markus Ruettermann）教授在〈「往來物」的概念形成——與日本中近世的教育與禮法之關連〉一文中，指出很難單以手習的史料概括「往來物」的概念，考慮到手習的機能性，不如限定在「往來物」的文體，以及書翰文簡的教材來考慮。日本關西大學增田周子教授在〈明治期日本與「國語」概念的成立——關於文學家的言論〉一文中，指出明治政府力求國家一統，將「東京語」定為標準語，背後隱藏的就是利用甲午戰爭，藉以統合國民意識的國家主義思想。在此，明治期的文學家們扮演了壓抑政府的角色，國語概念之所以未能在明治期確立，有其歷史性的意義。日本慶応大學寺澤行忠名譽教授在〈關於正岡子規的《古今集》批判——看日本文學的美理念〉一文中，提到在子規的《短歌革新論》的影響之下，近代的短歌否定《古今集》與以此為本而生的傳統和歌，王朝和歌所具有的豐富表現技法也因而隨之喪失。時至今日，應重新審視子規的短歌革新運動。東京工業大學摩頓教授在〈關鍵概念詞的再檢討：日本近代短歌中的「風景」——前川佐美雄與大和〉一文中，指出在1930年代的現代短歌推動者前川佐美雄的詩中，「風景」不只是具有歷史與傳統的所在，也是內涵文化性記憶的場所，同時也可以是觀光客個人的場域，此間並不矛盾。日文研客座教授多田伊織在〈從言語到實踐：森鷗外晚年的「考證」概念規定〉一文中，提出森鷗外（1862-1922），森鷗外自陸軍退役後，便在報紙上連載史傳小說，但並不受讀者的好評。隨著鷗外就任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長，他轉向致力於「新時代式的考證學」，成就了一部分的《帝室博物館書目解題》、《帝室博物館藏書人名抄》，直至因肺結核逝世。大阪產業大學竹村民郎名譽教授在〈檢視大正文化——與孫中山的關聯為中心〉

一文中，指出在大正年間隨著交通建設與經濟發展，形成了「大眾消費社會」，進而產生了大正文化。然而關東大震災造成的傷害，使得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文明觀。孫文在此時於神戶演講「大亞細亞問題」，提出使東亞民族彼此平等、相互團結的觀點，然而這與以日本為首的大亞洲主義衝突，因而無法實現。日文研石川肇研究員在〈從田村泰次郎所著《日月潭工事》探討日本行動文學主義〉一文中，指出在1930年代無產階級文學崩壞之後，曾經短暫地風行過行動主義文學，提倡知識分子以能動精神確立自主性，積極地對社會做出貢獻。田村泰次郎（1911-1983）的〈日月潭工事〉描寫在殖民地臺灣的支配與榨取，雖被評為成功的社會小說，卻不被認為是行動主義文學。對此，我們或需重新審視行動主義文學的定義。

在前後兩次盛會中，與會學者針對相關議題有許多精采發言。筆者有幸參與兩次盛會，在此略述淺見：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內容十分多元且深刻，但終歸不離開「近代」、「東亞」、「概念」三大核心議題。三項核心議題恰好對研究的時間、空間以及對象作出了精確的限定，實乃有其必然性。粗略地說，從「近代」走到「現代」的這百多年間，東亞可以說是一個共同體，一同面對近代化的各種議題。近代化的過程可區分為縱向跟橫向，縱向是指東亞各國如何以自己的傳統概念，承載來自西歐、新移入的近代概念，並使之「本土化」。橫向則是指在面對近代化議題的時候，東亞各國如何參照、模仿與影響彼此的對應方式。此一過程一直持續發展、影響著東亞地區直到今日，最終，我們以「事後之明」，雖然可以看到在一條名為「近現代」的時空長河裡，展現了一段「近代化」的歷史脈絡。因此，如果可以探討存在於近代東亞各種概念的思辯過程，進而剖析近代化的歷史脈絡，自然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臺灣的「自我」、從東亞諸國各自的立場所見的「他者」，以及臺灣在東亞乃至於世界中所身處的位置。總言之，兩次盛會圍繞著「近代的概念」，開啟了許多議題，也為今後的東亞研究得以愈形深入，提供了新的起點。